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0.05.004

中国模式的70年成就及其世界意义

——17位国外左翼学者的视角

宋朝龙¹, 李文宇²

(1.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2.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模式的70年成就及其意义,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与参加2019年10月12—13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外国学者们展开了对话。来自美、俄、法、韩、印、巴西、芬兰、希腊和爱尔兰等9个国家的17位外国学者就中国模式70年成就、中国模式的本质属性和特征、西方世界的经济困局、中国模式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作用和挑战等问题,从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模式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键词]中国模式;70年成就;全球化;外国学者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8)05-0023-08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模式的70年成就及其意义,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与参加2019年10月12—13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①的外国学者们展开了对话。参会外国学者包括:芬兰社会保障中心高级研究员佩蒂·哈基宁(Pertti Honkanen),爱尔兰国立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特伦斯·麦克唐纳(Terrence McDonough),印度旁遮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包文德尔·辛格·提瓦纳(Balwinder Singh Tiwana),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萨拉邦德(Chandrasekharan Saratchand),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前执行秘书长、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教授埃米尔·萨德(Emir Sader),法国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秘书长丹尼尔·塞瑞拉(Daniel Cirera),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大卫·科兹(David Kotz),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尤里·瓦西里耶维奇(Taranukha Yuri Vasilievich),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教授赵英男(Cho Young-Nam),韩国瑞永大学副校长李龙洲(Lee Yongyeon),韩国瑞永大学教授金允培(Kim Yoonbae)、具伦希(Cho Hurnjin)、赵献珍(Koo Yoonhee)、金镇英(Kim Jinyoung)。这些外国学者从不同方面就中国模式70年成就、中国模式的本质属性和特点、西方世界发生变局的原因、中国模式在全球化秩序中的作用和挑战等问题发表了学术见解。国外学者的观点和看法对中国模式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收稿日期]2019-11-01

[作者简介]宋朝龙(1977—),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文宇(1998—),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学院大创班学员。本次学术访问得到了田向东、杨胜博、韩翌旻等同学的帮助。

^①“当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也被称为第三届“小世马会”。2015年、2018年,北京大学召开了两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每两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之间,还会召开一次小型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简称“小世马会”。

一、中国模式的 70 年成就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新中国 70 年风雨历程的沧桑巨变和发展成就给国外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怎样认识新中国 70 年的发展、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的发展历程意味着什么,等等,对此,多位国外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新中国 70 年来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巨大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科兹认为,新中国成立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他于 1985 年首次访问中国,目睹了中国自那时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进步。哈基宁认为,中国 70 年来,特别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也十分发达,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水平较高。与科兹和哈基宁的观点相类似,萨德将中国 70 年的发展称作世界历史中的壮阔图景。在他看来,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战胜种种压迫而争得独立;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不仅在经济领域,还在人民的公共权利等方面,实现了一系列发展。赵英男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韩国和日本对比,指出在增长率、增长持续时间、人口和经济体的规模等指标上,中国的发展是日本和韩国难以望其项背的。他认为,称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为奇迹,是毋庸置疑的。赵献珍则表示,中美贸易摩擦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在 70 年的发展后所达到的水平,即已经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瓦西里耶维奇目前在深圳工作,用俄语讲授微观经济学。他说,自己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近 30 年来中国的巨变令他印象深刻。瓦西里耶维奇认为,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麦克唐纳称,对比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称中国 70 年所取得的成就为奇迹毫不为过。塞瑞拉也表示中国的发展速度尤为引人注目。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年使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金允培则对中国 70 周年国庆阅兵式和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和平的强调,表示印象深刻。他认为,70 年来中国军事力量无疑有了质的飞跃;维护和平也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中国也成为可以牵制美国的重要力量。

第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赵献珍认为,国家发展与制度、领袖和国际环境都有密切联系。萨拉邦德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哈基宁则表示,新中国前 30 年中建立的重工业体系为中国今日所取得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瓦纳强调,当我们谈论中国的发展时,尤其不能忽视 1949 年到 1978 年这段时间。虽然在这 29 年中,中国实现的发展还比较有限,但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经济的基本结构是面向解决人民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此后,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提瓦纳说,尽管 2008 年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中国实行独特的政治体制。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转为依靠内需,但这也没有动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他对此乐见其成。塞瑞拉则更看重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期。他认为,新中国的 70 年经历了不同阶段,但 1978 年以后的阶段是最重要的。因为 1978 年的改革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政治方向;此后二三十年来对全球化的参与,也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科兹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结合起来考察,认为自 1952 年起,中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 25 年;没有这 25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改革开放前的阶段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准备了条件。而自 1978 年以来,科兹说,中国为人民提供教育、妇女参与劳动的机会,推动社会平等。但是,如果没有中央计划时期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经济的快速增长仍是不可能的。科兹谈到,从 1978 年起,中国将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相结合,带来了持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 GDP 年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麦克唐纳则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不能一概而论,应分别进行分析,以便得出更确切的结论。他还主张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以 1992 年为界,也分为两个时期来考察。此外,学者们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问题也表达了各自的看法。科兹承认,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挑战,如贫富差距问题,对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了威胁。此外,计划与市场、国有制和私有制之间也有矛盾。哈基宁也谈到了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并对此感到担忧。瓦西里耶维奇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此前苏联模式存在的弊端的纠正。他认为,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中国应该重视的问题;中国需要更多地总结苏联的经验教

训。他特别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遗留的问题都是硬骨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第三,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中国模式 70 年成就斐然。塞瑞拉在法国共产党中主要负责前沿研究工作,以探索适合法国和欧洲的发展道路,以期建设比资本主义更公正合理的社会形态。塞瑞拉表示,必须承认中国在历史和当下的地位都十分特殊,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发展也将回答下列问题,即我们如何改变思维、变革社会秩序,而不是始终站在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立场上。萨拉邦德认为,中国 70 年的发展成就十分值得研究,特别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应当借鉴中国的经验。萨德生于巴西,曾任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CIACSO)执行秘书长,积极推动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交流。他表示,21 世纪充满了机遇,而中国的实践为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处理不同国家人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范例。他还特别强调,对巴西而言,金砖国家^①是反对霸权主义、尊重多元文明的新型国际组织;而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对巴西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萨德非常希望中国和拉丁美洲能建立起和谐友好的关系。

二、中国模式的本质属性和特点

在考察中国和西方发展实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模式无疑更有意义。中国模式为什么行?中国模式特殊在哪里?与苏联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各有何不同?中国模式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什么样的?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换言之,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中国模式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国外学者就这些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中国模式开创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秘诀。提瓦纳认为,谈论中国模式时,苏联模式是绕不开的;开创中国模式是为了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萨德说,苏联模式的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过分限制了市场和民间的活力,最终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他强调,不考虑苏联的失败,就不能理解中国模式。萨德还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模式的失败为社会主义实践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金镇英表示,中国的发展成就就是对社会主义失败论的有力反驳。她认为,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金允培则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开放的社会主义,它在学习借鉴和坚持自我方面实现了平衡。哈基宁说,在中国模式下,共产党领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属性。他表示,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使他进一步理解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在此意义上,哈基宁认为中国发展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模式。而在瓦西里耶维奇看来,改革开放是列宁新经济政策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他认为,中国模式在激励机制、利用市场建设社会主义和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与此同时,中国也没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从而确保了无产阶级政党对经济发展全过程的管理。瓦西里耶维奇说,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秘密。

第二,中国模式从建立到完善,经历了长期实践和探索。科兹将中国模式的逐渐完善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他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构想激发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然而,在 1978 年之前,中国确切的发展方向实际尚未确定。因此,中国必须找到通向未来的道路。麦克唐纳则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的前后两个时期有着本质差别。他不赞同过多强调前后两个时期中的共性。在麦克唐纳看来,每个历史时期在内部逻辑和连贯性上都有完整性;这种协调一致是由制约经济的不同制度所决定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当这些制度运作良好、协调有序时,经济才能正常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运作方式是不同的。麦克唐纳运用他的阶段理论分析中国的 70 年时认为,在 1978 年之前,中国经济是重工业和社会动员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协调程度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进程,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就不成功;而 1978 年以后,特别是 1992 以后,多种所有制并存、劳动力市场化、政府干预减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起来。他认

^①金砖国家(BRICS),指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和南非(South Africa)等发展中的大国,由于这些国家英文首字母组成的 BRICS 与英语单词的砖(Brick)接近,故被称为“金砖国家”。

为,改革开放的前后两个时期确实存在国家管控经济发展的共性;但是,这两个时期的所有权关系实际上是不同的。

第三,中国模式体现了中国的特殊性,同时也包含普遍性,值得国际社会学习借鉴。赵英男认为,中国模式是东亚模式的一种变体,是东亚发展模式的中国版。赵英男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都可以找到东亚发展模式。他归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性,即发展至上、国家主导、社团主义和属于自己的发展理念;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外国投资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赵英男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海外华人华侨群体的投资和中国的巨大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萨拉邦德认为,中国模式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创举,开创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新路。他谈到,中国的政府机构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存在着质的差别,这与新自由主义模式完全不同。萨拉邦德说,中国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而且目前已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向中国学习。塞瑞拉同样认为,“走自己的路”不是中国的专利,但只有中国真正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科兹提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为市场经济对此无能为力。他还以二战时期美国举国动员、备战参战为例,指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和关键历史时期,计划比市场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因此,科兹认为,中国模式在上述领域有着独特的优势,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

第四,中国模式存在进一步丰富完善的广阔发展空间。塞瑞拉主张从中国与发达国家、中国与南半球发展中国家联结的角度,审视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塞瑞拉认为,中国模式的独创性在于正确应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他说,数字革命和环境危机使当今的发展问题与 20 年前相比已经大为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面临着能源、农业、气候变化等种种难题,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萨德比较了中国与巴西的发展模式,他认为,巴西目前是极端新自由主义政府,和当今中国可谓是鲜明的对照;但是在卢拉总统时期,巴西与此完全不同。萨德还提到,当今拉丁美洲的一些领导人持反新自由主义立场,如查韦斯^①。他认为,尽管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家采取的发展模式与中国不一样,但也并非是完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提瓦纳承认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开创了新的发展道路。但他同时强调,发展中国家看重中国模式带来的农业和制造业的高增长率,同时对中国模式目前仍存在的弊端,如不平等问题,也感到尤为关切。

三、西方世界发生变局的原因

与中国使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协调推进的局面相比,西方世界不算太平。英国脱欧、特朗普掀起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兴起,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态在近些年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世界发生变局的原因是什么?应对变局的方式有哪些?未来的走向如何?不同国家发生的变化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就这些我们关心的问题,多位外国学者进行了解答。

第一,西方世界的变局是综合性危机的表现。塞瑞拉将民粹主义^②视作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和集中爆发形式。以法国为例,他说他这一代人要同时养活上下两代人,但是住房、医疗成本却持续上涨,失业问题也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因此,社会危机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此紧密相关。此外,他认为 2008 年经济危机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从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美国爆发的,结果是政府将巨额资金用于挽救大公司。这直接在政治观念上造成了巨大影响,非常可能促成民粹主义。赵献珍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富足程度下降,市场需求急剧减少。哈基宁认为,

^① 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 1954–2013),委内瑞拉政治家,1998 年 12 月当选为总统,并在此后的三次总统大选中获胜。查韦斯积极推动拉丁美洲的“21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对经济社会做了很多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改革。

^② 民粹主义是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思潮和政治运动。民粹主义把西方金融资本积累造成的危机归咎于其他国家或族群,强调本国国民的身份认同,强调国家主义,试图以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的形式解决危机。民粹主义是得到部分民众支持的极右翼性质的政治运动。

一方面,经济危机引发了西方民众对政治价值观的信仰危机;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欧国家中左翼党派力量弱小,美国甚至没有左翼政党。这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赵英男从两个角度分析当代西方世界变化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即民主化的倒退,国家对自身利益和经济发展的重视超过了对普世价值的坚持。二是中国崛起打破了世界的权力平衡。麦克唐纳尤为关注历史中不同时代的分期问题,并根据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开展研究。麦克唐纳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 20 世纪 90 年代的金融危机而告一段落。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竞争阶段、垄断阶段,还是新自由主义阶段,都以危机结束。因此,他主张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基础上认识西方世界的变化。麦克唐纳认为,自上世纪 70 年代的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复苏势头远不如二战后的黄金时期。此外,经济增速尽管较为稳定,贫富分化却十分严重。他说,西方社会将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戏称为全民中的“百分之一”现象。最后,西方体系更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而陷入困境。

第二,西方世界的应对方法治标不治本,未来走势存在不确定性。萨拉邦德认为,为应对 2008 年危机而提出的替代政策,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成为现有政策的延续。他指出,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并没有使美国工人摆脱越来越沉重的压榨。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更低的账户盈余或更高的贸易赤字。这遭到了以中国为首的国家的抵制。提瓦纳说,西方世界的变局无疑始于 2008 年,与以银行倒闭为背景的政治经济危机有关,这场危机的影响仍没有完全消散。危机带来了经济增长滑坡和失业率高企等问题,发达国家和中东国家也试图转嫁危机。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都与此有关。他认为,战争、经济施压和贸易战,都是解决危机的方式。瓦西里耶维奇认为,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产生了两组基本矛盾。资本流出母国追求更大利润,而母国政府又必须为公民提供就业以及养老和医疗服务。此外,全球化意味着对利润的跨国追逐,但同时也意味着竞争加剧。因此,特朗普作为美国资本家的代表,反对全球化,想让资本回流美国。但瓦西里耶维奇同时强调,特朗普有可能使全球化进程变缓,但不可能阻止全球化;这也是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的。科兹说,他倾向于用“威权右翼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当前西方国家中的所谓民粹主义。他表示,在英语国家,“民粹主义”一词通常是指能造福于普通百姓的政策。但是最近的政治人物和政党,例如特朗普、约翰逊,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并没有为普通百姓办实事。科兹说,相反,他们将问题归咎于其他民族、种族或少数族裔。他认为,2008 年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经济的长期停滞,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会放大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众的不满。科兹认为,上世纪 30 年代的情况与之类似,那时,资本主义有法西斯主义、罗斯福式的改革和转向社会主义三种可能。然而他强调,在当前向社会主义转变可能并不在政治议程上。因此,资本主义体系必须进行改革,在工人权利、利益共享和绿色政策方面有所作为。萨德表示,英国与美国背离了大多数国家,其领导人也背离了本国大多数国民。因此,对于两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他认为,如果英国今天举行选举,那么工党必胜;而特朗普也无法战胜民主党获得连任。麦克唐纳的观点与之不同。麦克唐纳认为,西方的问题是要告别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进入资本主义的新纪元。他对这种新纪元的社会基本制度做了设想,认为有逐步脱离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方式、回到社会民主主义和陷入右翼民粹主义三种可能性。他在比较了英美主要政党内部的派系及其主张后,对未来民粹主义是否将继续主导两国政坛感到不确定。

第三,在当下国际经济的变局中,不同国家面临不同的情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萨德认为,当前英美两国都反对全球化。例如,特朗普本着“美国第一”^①的思想,认为本国国家利益更为重要,拒绝继续担任西方集团的领袖。因此,美国与欧盟、日本之间产生了冲突。但在萨拉邦德看来,在应对危机方面,英国实际与美国不同。他认为,英国工党的新领导层正试图提出一种替代方案;相应地,保守党的领导层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约翰逊的民粹主义。麦克唐纳也表示,目前来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政策,实际都是对外推行民族主义和逆全球化,对内继续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麦克唐纳认为,

①“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是特朗普在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提出的口号。特朗普批判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原则,认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原则导致了美国的衰落。特朗普总统举起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旗帜,采取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

英国与美国之间也存在具体区别。英国脱欧更多地是出于对移民问题的担忧,并非真正的经济保护主义;而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实际包含在经济保护主义之内。具伦希从既得权力阶层同其反对阶层之间矛盾入手,她说,之所以出现英国脱欧和美国反移民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国既得利益者认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有利。具伦希还提到,韩国也有此类情况,只是矛盾冲突不如英美尖锐。提瓦纳谈到,西方世界面对变局,不仅对中国施压,对印度也没有手软。例如,美国要求印度打击恐怖活动以促进贸易增长,要求印度为美国的商品和贸易开放市场。塞瑞拉则指出,中国凭借劳动力的成本优势,长期从全球化中获利;而法国工人阶级因金融市场和雇主对全球化的利用而损失惨重。他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法国工人权益的进步,来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下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塞瑞拉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加工时和延迟退休极大损害了工人利益;再考虑到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以私有化作为解决手段根本是杯水车薪。因此,他主张更多的公共干预。塞瑞拉也提到了法国国内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四、中国在全球化秩序中的作用及面临的挑战

随着中国的发展崛起和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越来越走近国际舞台的中央。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全球化秩序中的作用成为国内外关心的议题。中国在全球化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产生了哪些影响?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中国在全球化中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对此,多位外国学者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中国在全球化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日益成为全球化秩序的维护者和倡导者。哈基宁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非常有建设性的积极主张。他认为,这说明中国非常乐意与其他国家合作。不仅很多发展中国家,欧洲国家也能够从中受益。科兹不赞同将“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措施视作旧殖民主义的翻版。他从多年研究经历出发,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依赖于对全球经济的深度参与,但是社会主义原则在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产生不了控制其他国家的动力。麦克唐纳则认为,中国对全球化的积极参与,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然选择。他认为,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面临两个问题:满足人民需要和实现国家的自主发展。照常理来说,较发达的经济体,比如美国,更倾向于自由贸易;而相对落后的经济体,比如中国,则更侧重独立自主。但事实是,现在中美各自的立场是颠倒的。对此,他认为,这与两国所处的竞争地位有关。麦克唐纳说,中国对自由贸易的重视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实力。因为经济主张并不是抽象的政治理念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它其实反映着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因此,麦克唐纳对中国在贸易中的角色转换,例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毫不意外。他认为这是中国发展水平接近西方的自然结果。提瓦纳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在他看来,中国可以通过投资帮助许多国家发展,将众多国家联合起来。萨拉邦德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许多国家,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套替代方案。塞瑞拉认为,全球化在过去短短几年内进入了新时期。在过去,中国更多地扮演着被发达国家利用的角色。通过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达国家获利颇多;但现在,来自中国的竞争日趋激烈,单方面利用中国的日子结束了。塞瑞拉表示,这使资本主义的发展遇到了大问题。他认为,雪上加霜的是,当前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来解决极端贫困、气候变化和教育等关乎人类发展的问题;但对抗日益取代合作,全球化面临危机。在塞瑞拉看来,全球左翼需要联合,全力以赴开展斗争,反对对抗和反压迫是当今全球化的关键命题。他希望中国的发展战略能成为解决当今全球普遍问题的助力。萨德认为,就中国自身来说,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衰退,发展潜力不可限量;这也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利用了美国空出的国际空间,提倡互利互惠的新型国家关系。现在,法国和意大利正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战略的成功。

第二,中国在全球化中发挥的作用存在提升和优化的空间,中国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应有充分认识和准备。萨拉邦德强调,国际合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他从印度自身的立场出发,谈到中国应尽力消除一些国家的顾虑,以便更多国家积极参与。金允培表示,外界对“一带一路”倡议

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以其本人为例,对“一带一路”的印象就经历了从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到促进民心相知、民情相通的转变。金允培基本肯定“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效,但对具体落实层面仍存在的一些不足表示担忧。此外,他还希望相关政策能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长期延续。瓦西里耶维奇充分肯定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对全球化的积极参与,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但他也提出,中国必须为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困难做好准备,避免重蹈欧洲共同市场的覆辙。瓦西里耶维奇说,毋庸置疑,目前中国是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因此,中国应与沿线国家建立互助关系,以避免其他国家的怀疑。他强调,这种情况出现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意愿,中国对这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必须有充足的思想准备。科兹格外强调,当下全球经济的运作方式必须得到调整,以使普通人能从中获益而不是受到伤害。他希望中国能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不成功实践为鉴,避免新自由主义的过度影响,将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到底。赵英男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对周边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富有吸引力,比如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但他同时提醒到,韩国、日本和英美法德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比较敏感。他提醒中国应重视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情绪。总之,国外学者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充满期待的,他们希望中国能发挥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并向国际经济关系延伸,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积累秩序的新型国际关系,面对有些西方国家及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质疑和阻挠,中国要有思想准备和主动的战略应对。

第三,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瓦西里耶维奇谈到,在俄罗斯,人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因为中国年轻人日益表现出片面追求物质享受的趋向。因此,他建议中国要加强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品质,以避免人的异化。科兹则建议中国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朝着共产主义不断前进。赵英男也指出,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问题上,要紧的是走自己的路,不能迷信外国学者。

第四,中国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增长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和内需拉动。中国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伦希和赵献珍建议中国要加强生产领域的创新;赵献珍还主张中国应重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提瓦纳认为,中国应当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以国内市场为侧重点,开发内需,服务于自身发展。为此,他还建议中国让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红利惠及更多人民,尤其是穷人和农民。提瓦纳说,这对实现中国自身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而过分关注国际市场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塞瑞拉强调中国政府应当始终做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金允培建议中国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民族矛盾和人口问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萨拉邦德也主张,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进步,已经能在教育、医疗保险等领域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福利。他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已经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可行的替代方式。他建议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公共资源的投入。此外,萨拉邦德还建议中国确保人民群众对企业和社区决策的参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瓦西里耶维奇认为,对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中国政府需要探索新的激励机制,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此外,贫困问题也不可忽视。哈基宁建议中国完善税收体系、养老金制度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五,中国应善于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教训,加强文化建设和理论创新,提高国际话语权。中国应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参与国际交往,做负责任的大国。麦克唐纳认为,中国目前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存在扭曲。因此,他建议中国客观评价毛泽东时代,从中汲取更多有益经验。此外,对 1992 年以后的发展阶段,应该仔细回顾,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要辨别,以资借鉴。麦克唐纳说,中国不应担心对 70 年历程的回溯会改变中国当前的道路。他认为,正是 70 年历程的丰富实践为中国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学习资源。萨德曾多次到中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他建议中国应加强对成功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提炼,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中国模式成功的必然性,从而打破美国的话语垄断。金镇英则从韩国自身发展的经验出发,认为中国要重视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她建议中国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同时增设人文学科基金,使社会更加重视人文学科的发展。哈基宁建议中国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

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李龙洲建议中韩间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互信,实现更好的发展。金镇英建议中国妥善协调和处理中日韩三国间的关系。赵英男说,中国在强调自身的发展成就时,要考虑周边国家的态度。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感到恐惧。例如,中国强调,对自身核心利益决不让步,这在涉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发展问题时,难免让他们担心。赵英男认为,中国眼中只有美国,对周边国家的重视不够;而周边国家比如韩国,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主张也半信半疑。他谈到,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安全问题也是重要关切。从韩国自身来说,萨德事件以后,举国上下对自身安全都较为担忧。赵英男总结到,中国要成为大国,就不能不认真考虑其他国家的安全问题。科兹表示,当今世界是全球互联互通的时代,中国与美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国不能忽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需要谨慎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并建议两国共同寻求从对抗走向合作的途径。金允培则谈到,中国在展现国防实力的同时,突出自身维护世界和平的意愿也必不可少。

五、结语

新中国走过了 70 年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 70 年里,中国通过不断实践和探索,在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之外,建立了中国模式,走出了属于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者的结合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中国的发展方式与发展成就,也具有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方案。当然,中国模式也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新中国的 70 年发展史,也就是中国模式的探索、确立、调整和发展史。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与中国相比,西方世界不算太平。西方社会的综合性危机引发了英国脱欧、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等乱象,其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西方应对危机和调整政策的空间都较为有限,西方世界和全球局势的未来走向面临不确定性。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以“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国际治理,并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日益成为全球化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中国应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好和处理国内外的困难与挑战,不断完善中国模式。

The Seventy Years'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Model and its World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venteen Foreign Left-Wing Scholars

SONG Chaolong¹, LI Wenyu²

(1.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year 2019 i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70 years'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model and its significance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academic circles. With these questions, we have had dialogues with the foreign schola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on October 12-13, 2019. Seventeen foreign scholars from nine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France, South Korea, India, Brazil, Finland, Greece and Ireland have expressed their views on the 70 years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model,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model, the economic dilemma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role and the challenges of the Chinese model in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from multiple angles, dimensions, and levels. These view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hinese model to form a correct self-awareness.

Keywords: The Chinese Model; Seventy Years' Achievement; Globalization; Foreign Scholars

责任编辑:郑伟

學人風采

李海滢

辽宁抚顺人，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第三届“十大青年法学家”，先后到美国杜克大学、马里兰大学交流学习。现为中国犯罪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犯罪预防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吉林大学犯罪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刑法学、犯罪学、法政治学。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10余项，出版个人专著、主编和参编各类著作、教材10余部，在《当代法学》《法律科学》《政治与法律》《刑法论丛》《法学杂志》等发表论文近50篇。成果先后获得吉林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吉林省法学优秀成果奖、民建中央重点理论研究课题优秀成果奖等。



宋朝龙

安徽利辛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金融帝国与当代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学术理念包含如下三点：1. 德国古典哲学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德国古典哲学提供了基于事物本质自身矛盾转化的世界观、逻辑形态的辩证法、作为人类自由和人类解放哲学的实践哲学。2. 金融资本和金融帝国批判是《资本论》所规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任务在当代的延伸，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核心命题。3. 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任务是研究超越金融帝国世界统治的条件、道路和制度形式。在上述学术理念的指导下，出版了《社会生产方式的二重结构——技术决定论批判》《边缘社会主义的起源》等专著2部，编著2部，发表论文50多篇。